

也说唐标铁柱

王旭晖

近阅省报州报,看到一批考证、评价“唐标铁柱”的文章。其中对唐九征所建铁柱的具体位置的考证,大体近似。然对于该铁柱的评价,笔者不敢苟同。因为,唐九征所铸铁柱是对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破坏的见证,对南诏、对白族先民来说,无疑是根耻辱柱。

唐神龙元年(公元705年),唐朝派监察御史李知古,“兵击姚州洱河蛮”。据史书,李知古的任务是讨伐先依附吐蕃,后内附唐朝,未几复叛唐附蕃的浪穹、邓赕二诏。当时唐蕃之间争夺洱海区域控制权的斗争十分尖锐,从维护主权、维护统一的角度看,唐派李知古征伐降附无常的三浪诏,具有积

极意义。当时蒙舍诏(大蒙国)是第二代诏王蒙罗盛在位。大蒙坚持蒙细奴罗的内附,不在李知古的讨伐范围。

据新旧唐书及方志,李知古由姚州进兵,到达洱海腹地邓川,邓赕诏主投降,李知古先受其降,后仍寻找借口把他杀了。李知古“因是欲诛其豪酋”、“重税之”、“入子女为奴婢”,导致“群蛮怨怒”。于是浪穹诏主发兵,在邓川诸蛮的配合下,攻杀了李知古。这个李知古是个刚愎跋扈、贪虐凶横的悍将,完全不采纳他的副手徐坚的阻谏。他的被杀,固是咎由自取。三浪诏由是愈发倒向吐蕃一方。

唐廷因之于景龙元年(公元707年)重新派灵武监军唐九征为姚嵩道讨击使,再度发兵洱海。“击姚州蛮,破之”。有没有攻打三浪诏?史书中没有说,惟言“出永昌郡千余里”、“累战皆捷”、“虏以铁索梁漾、濞二水,通西洱河蛮,筑城以镇之”,“九征毁索夷城”、“建铁柱于滇池以纪功。景龙二年还。”这就是唐九征此役的大体经过。

漾濞当时亦为河蛮所居之地,史料中说,时称样备诏,又言属蒙舍诏。二水之上的铁索桥,为南方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通设施,是南诏经永昌出骠国的必经之桥。滇西山高谷深,江水湍急。尤其雨季时江水暴涨,桥便成了两岸交通的唯一通道。云南各族人民为了克服江水对交通的阻绝,曾造过各式各样

的桥:竹索桥、藤桥、木桥。南诏时漾濞二水上的铁索桥无疑是最先进的,其安全系数,高于竹桥、藤桥不知多少倍。当时吐蕃势力南下,一度占据剑川一带。吐蕃军队多为骑兵,不可能从吐蕃本土携来工匠,运来铸造铁索的生铁。考虑到南诏此前几百年已有铁的使用,铁柱会盟时(公元648年)的铁柱可为明证,则漾濞二水上的铁索桥,实应为白蛮先民所建。即便是吐蕃所为,也必然是使用当地的工匠、当地的铁。换句话说,茶马古道上的这两座铁索桥,凝聚着白族先民河蛮的智慧和汗水,凝聚着河蛮对茶马古道的贡献。

唐九征是个短视的武官。他以为“毁缙夷城”,就能阻挡吐蕃的铁骑,天真幼稚得实在可以。翻开史书,触目皆是吐蕃寇蜀、寇陕的记载,甚至还曾打到长安。那些方向,未闻有“铁索”。元人渡金沙江,用的也只是“革囊”。战争中,有桥可以渡江,无桥也一样要渡江。无数历史事例,都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唐九征肆意毁去铁索,并用所熔之铁立柱纪功,苦了当地民众,苦了依赖茶马古道进行物质交换的各族人民。他们失去了铁索桥,不得不重新依赖竹桥、藤桥。这对当时边疆的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,无疑造成了极大阻碍。白族先民的智慧结晶被唐九征毁于一旦,铁索的主人保护不了自己的辛勤成果,无疑是一种耻辱。无知而骄横的唐九征居然还在当地立柱纪功,这铁柱,就该是压在当地民众心上的耻辱之柱。

我以为,这才是讨论“唐标铁柱”给我的最大启迪。